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后浪

「美」丹尼尔·贝尔——著 高钰等——译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Daniel Bell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美」丹尼尔·贝尔——著

高铨 王宏周 魏章玲——译 高铨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Daniel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章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 (美) 丹尼尔·贝尔著; 高钰, 王宏周, 魏章玲译.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210-09921-5

I . ①后… II . ①丹… ②高… ③王… ④魏… III .

①后工业社会 (经济学) — 研究 IV . ① F03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4291 号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by Daniel Bell

Copyright © 1973 by Daniel Be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inkgo (Beijing) Book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n imprint of Perseus Books, LLC,

a subsidiary of Hachette Book Group,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版权登记号: 14-2017-0487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作者: [美] 丹尼尔·贝尔 译者: 高钰 王宏周 魏章玲

责任编辑: 辛康南 特约编辑: 刘晓燕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营销推广: ONEBOOK 封面设计: 张静涵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出版发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720 毫米 × 1030 毫米 1/16 35 印张 字数 530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0-09921-5

定价: 11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1-2017-899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10-64010019

中文版序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以下简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最新版的中文译本现在出版面世,可喜可贺。

该书在30多年前的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首部中文译本(内部发行)。其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于1989年在台湾出了此译本的中文繁体字版。新华出版社1997年在大陆正式出版发行此书,并将其收入该社《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

多年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在国内外广受瞩目,“后工业社会”一词也成为当代的流行语。贝尔所提科技发展与现代社会的特征,在当今世界的许多方面有所印证。现在,江西人民出版社与后浪出版公司郑重推出原书最新版的中文译本,并收入作者的长篇新版前言,使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考与主张更完整地展示给广大读者,至为重要。

新版中文本的翻译分工如下:高铨——1999年版前言、1976年版前言、1973年初版序、第1章、结语;王宏周——导论,第2、3、5、6章;魏章玲——第4章。高铨负责全书审校及新、旧版内容核改。

历次中文版(1984、1989、1997)均附有译者序言,主要是译者联系多年研习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体会对本书的一些思考,虽是多年前写的,但内容主旨并未过时,现综合补充如下,供读者参阅:

2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所热衷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社会变迁加速，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这些因素推动未来研究与发展研究日益结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与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发表以来，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方瞩目。

战后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探讨上日益扩大和深入，理论结构也出现相应的演进，即：由初始的**经济增长理论**演进为**经济发展理论**，再演进到**整体发展理论**。战后初期以至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研究主要反映西方经济学界探索经济增长的要求。哈罗德（R.F. Harrod）和多马（E.D. Domar）的经济增长模型、拉格纳·纳克斯（Ragner Nurkse）的平衡增长理论和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动”理论以及罗斯托（W.W. 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等都反映当时以加速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视经济增长为发展主要标志的西方传统派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日益证明，以西方大国的目标和模式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理论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经济指标的增长并未带来贫困的减少和大多数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增长不等于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理论日益兴起，成为经济学重要的一支，是为**发展经济学**。有人提出：增长经济学主要以发达国家为对象，发展经济学则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发展经济学家都逐渐重视增长指标以外的其他发展要素条件。例如，提出了“满足基本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与目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明确认识到发展不单是实现经济目标，而且应重视社会目标以及其他有关条件。经济发展理论由此逐渐演进到**整体的发展理论**，即探讨和研究包罗经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价值观，以至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多学科的社会整体发展。

20世纪70年代是各种发展理论比较集中提出的时期。现试把其中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列举，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分析与设想，也可以反映未来研究和发展研究相结合的趋势。

1970年 W.W. 罗斯托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从而完成其1960年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的六阶段说。

- 1971年 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
- 1973年 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 1974年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依附论的基础上提出“世界体系论”，其主要观点包罗在《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中。
- 1975年 瑞典哈马舍尔德基金会 (Dag Hammarskjold Foundation) 发表研究报告《另一种发展》。
- 1976年 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 (Fundacion Bariloche) 发表研究报告《是灾难还是新的社会》，提出了人称“巴里洛克模式”或“拉丁美洲模式”的一项未来世界发展模式的设想。
- 1977年 里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f) 等学者发表联合国的研究项目《世界经济未来》。
- 1978年 法国西蒙·诺拉 (Simon Nora) 和阿兰·孟克 (Alan Minc) 发表《社会的信息化》研究报告。
- 1979年 勃兰特委员会 (Brandt Commission) 报告《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即：第一个勃兰特委员会报告。

其中，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分析，由于同世界科技革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而特别引人注目。

丹尼尔·贝尔 1919 年出生于美国一个贫苦犹太移民家庭。1939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后又获博士学位，1944 年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52—1969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92 年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授予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科学奖，还被美国社会学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他在芝大和哥大任教的同时，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还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史》《美国的新右翼》等。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1969 年起即在哈佛大学任教，同时，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有关的活动：曾任《公共利益》杂志二主编之一；担任过《代达罗斯》和《美国学者》杂志编委；1964—1966 年在美国总统的“技术、自动化与经济进展委员会”内供职；1966—

1968年担任美国政府“社会指标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66—1974年担任美国文理科学院的“2000年委员会”主席，1976—1979年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未来计划”的政府间顾问委员会美方代表，后任美国总统“80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在这20年中，他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基本权利》《极端右翼》《普通教育之改革》《今日资本主义》《走向2000年：进展中的工作》《大学的对峙》《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1980年发表了《曲折的航程——社会学历程论文集1960—1980》。各方公认他最著名的三本著作为：《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文版由张国清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及《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文版由赵一凡等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他自称自己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派、政治上的自由开明派和文化上的保守派”。贝尔于2011年逝世。

贝尔于20世纪50年代末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1959年夏季，贝尔在奥地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后工业社会”的名称，提出了他对未来西方社会的设想。其后，贝尔在1962年和1967年又写了《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和《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1-2》。1973年出版的本书对“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实例分析。他提出“后工业社会”的五大基本内容是：（一）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二）在职业上，专业与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三）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居于中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四）在未来方向上，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重视技术鉴定；（五）在制定决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是本书的姊妹篇，它着重从文化角度继续探讨“后工业社会”。贝尔在该书的“前言”中对两本书的重点与配合作了说明，他说：“两本书具有辩证的关系，互为补足。”《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力图说明，技术（包括知识）和理论的高度集约化，正成为创造发明和制定政策的新原则，日益改造着技术—经济体制和社会的阶层体系”；《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则“讨论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并讨论在社会价值观强调欲望不加节制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复杂政治形态的难题”，“当代资本主

义的种种矛盾是由于曾把文化与经济维系在一起的绳索已经解散，由于享乐主义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影响”。

西方学术界论述未来社会的许多见解在贝尔影响下套用了“后……”的前缀，以表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新类型社会的开始，有些描述未来社会的名称虽未使用“后……”的前缀，但也受到贝尔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下列的名称中可以窥见这股思潮的概貌以及贝尔的突出影响：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

后资本主义社会——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

后资产阶级社会——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

后现代社会——埃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

后文明社会——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

后集体主义社会——萨姆·比尔（Sam Beer）

后意识形态社会——刘易斯·福伊尔（Lewis Feuer）

后传统社会——艾森施塔特（S. N. Eisenstadt）

后市场社会——汤姆·伯恩斯（Tom Burns）

后组织社会——汤姆·伯恩斯

后经济学社会——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

后大规模消费社会——赫尔曼·卡恩与安东尼·威纳（Anthony J. Wiener）

后匮乏社会——《社会政策》杂志（Social Policy）

后福利社会——吉迪恩·肖伯格（Gideon Sjoberg）

后自由派时代——杰弗里·维克斯（Geoffrey Vickers）

新工业国——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技术电子社会——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规划社会——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

多面社会——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技术社会——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

超工业社会——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全球村——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这些未来预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以当前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贝尔对未来西方社会的探索，从技术分析联系到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中心、管理体制等方面，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现代的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革命。面对这场重大的科技革命，我们不但要重视其经济影响，而且要重视其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影响。贝尔已看到西方社会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巨大动荡之中，现有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都在迅速消蚀。因此，“时代终了感”是当代西方社会特有的文学形象，他预感到后工业社会会带来一整套新的匮乏和一系列新的问题。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出版多年之后，贝尔在1999年推出了最新版，对原书文本再次审核，并且增加了一篇8万多字的长篇“新版前言”。贝尔说：“后工业社会的名称、词语、思想和概念现已成为常见的流行语和学术词汇，虽然使用很广泛，但没有具体说明它意味着什么。”他强调：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和现实是在社会经济史的框架内出现的。所谓“工业革命”，是对技术与生产组织的新认识。技术不仅是以再生产方式制造物品，而是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合理安排，使工作甚至生活成分合理化。人类力量的“突破”成为改变自然和改变物质世界的基础。他说，许多人在写到后工业社会时仍然把它定义为首先有关服务业，但是这种定义是不恰当的，后工业社会崭新的中心特征是对理论知识的汇编以及科学与技术的新关系。他重申：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基础是用蒸汽泵和受控室作为动力并应用于机器。第二次技术革命可以确定为电力与化学两大革新。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第三次技术革命。四项革新是这一技术革命的基础：电子化、小型化、数字化和软件化。他说，今天我们正处在世界范围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上升过程，因为已经度过发明与革新阶段，进入扩散的关键阶段。但是，他强调技术并不决定社会变革，技术只提供手段和可能。“前言”最终讨论了后工业发展的范围与程度，以及社会变革的架构。

可以看到，贝尔在1973年撰写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方社会发展的途径和方式的基本分析与看法。其后，在1976年和1999年两次再版时，他都写了长篇前言，尤其是1999年最新版前言，它实际上是他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和补充。因此，虽名为“前言”，按逻辑顺序而言，等

于是全书文本之后的延续和发展，把他心目中描述的“后工业社会”面貌及影响细加刻划。

丹尼尔·贝尔这部名著定将引起读者们的巨大兴趣和深入思考。

高铨

2016—2017年补记于北京复兴路寓所

1999年英文版序 技术轴心时代

I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最初是在1973年出版的，1976年再版时加了一篇较长的序言。从此以后，“后工业社会”的名称、词语、思想和概念成为常见的流行语和学术词汇。从1997年8月6日到1998年8月8日的内克西斯数据库(Nexis)里搜索一下，可以发现众多人士的文章和讲话曾引用这个词语104次；在1996年开始的两年时间中，则有191次。

这种使用频率颇说明问题，有时使人好笑，有时令人吃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莱昂·布里坦爵士(Sir Leon Brittan)1997年9月在东京讲话时说：“我们正在设法艰难地过渡到成为具有老龄人口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1998年1月就内城区错位问题的根本原因撰文指出，关键在于“后工业社会”的就业岗位要求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在十几年间导致数十人伤亡的“炸弹狂人”^①在1998年1月提出，“如果有一

^① “炸弹狂人”(Unabomber)原名西奥多·卡钦斯基(Theodore John Kaczynski)，在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学过数学和哲学，后担任加州伯克利大学助理教授。他强烈批判社会，反对工业化和现代技术，主张以自然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从1978年至1995年期间在全国范围内以大学和民航作为对象，安置或邮寄炸弹以袭击从事现代技术的人士，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的案件定名为Unabom，意为“大学(un—)与航空(a—)炸弹(bom—)”，并将其定罪终身监禁。(据

家全国性报纸发表他那份批评后工业社会（即技术社会）腐败和灭绝人性影响的 35000 字宣言的话”，他可以结束战争。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发表了那份宣言时，“炸弹狂人”的弟弟大卫·卡钦斯基（David Kaczynski）认出了他的文风和用字，把他的身份报告了当局。

令人关注的是，世界各国领导人使用这一词语时不仅给予它高规格，而且往往具有警示意味。在 1998 年 4 月庆祝布拉格大学 650 周年时，时任捷克总统的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说：“大学研究不能完全由市场经济的需求所驱动；后工业社会要求大学记住它们关于‘通才学习’的本旨。”1998 年 6 月，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谈及亚洲社会的缺点时，把问题部分地归于“未能发展先进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需要的政治结构和技术”。

甚至美国总统也使用后工业社会的名称。在 1998 年 6 月 30 日上海召开的一次“塑造 21 世纪的中国”圆桌会议上，克林顿总统说：“在经济成长方面，你们几乎超越了传统欧洲国家和美国所经历的一个世代的发展，你们必然将同时创造出一个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以你们必须比我们更快地培养高水平的人才。”

当我询问撰写克林顿讲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时，他们告诉我说，总统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应是即兴的。可是也很明显，克林顿总统的话来自前一时期的白宫简报，这个问题已经被多次提出过。1998 年 5 月，新闻官迈克·麦柯利（Mike McCurry）和助理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rt）在一份白宫简报中的讨论涉及“后工业社会所受到后冷战时代的实质性挑战”。克林顿总统在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5 月间在首相休养地契克斯会谈时，谈到了同样的话题。迈克尔·柯里（Michael Curry）在英国伯明翰关于两位领导人及其助手会谈的一份新闻简报中重申了这一主题。

从这一切可以看清，西方各国领导人认为西方社会是“后工业的”，而世界其他地区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过渡到后工业国家。

“后工业社会”一词现在使用得很广泛，然而它意味着什么却往往没有具体说明。例如，伦敦《经济学人》（1998 年 8 月 22 日）在“后工业的格拉斯哥”一

文中写道：

到格拉斯哥来却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们看不到被烟灰熏黑和污浊拥挤的大杂院，在熙熙攘攘的船坞上空找不到丛林般的大老吊。……那个格拉斯哥已随着一度使城市致富的大部分造船业和钢铁业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从城市中心看，格拉斯哥就像一个集旅游、服务和商业于一体的成功的后工业中心。

这番描述意欲集中表现工业与制造业的衰落及服务业对它们的取代。但是它没有看到新兴的后工业世界中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非凡变化，服务业并不完全取代农业与工业（虽然它在实质上改变了它们），而呈现了新的创新方式、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新的社会阶级。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和现实应被归入社会经济史的框架：以前工业、工业与后工业世界为前后背景。^①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在过去 57 个世纪的头 55 个世纪中，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主要靠以采掘业为基础的经济——农耕、采矿、捕鱼、伐木——维持生存。马尔萨斯（T. R. Malthus）说得对，在那段漫长的时期里，人口增长受制于疾病、土壤衰竭和自然资源递减。移民与掠夺性战争是各民族常遇的命运。

然而，马尔萨斯是在 1800 年写下这些话的，从那时以来，世界已经大大改变。过去千百年来人们不知道的一种能源被发现了。石油可在封闭容器内被充分地利用。蒸汽泵把煤矿里的地下水抽走，使矿工掘进得更深，挖出更多的煤。英

①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背景“穷尽了”理解世界基本社会结构的方法。匈牙利裔的哈佛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i）指出，有两种制度主导着 20 世纪——以私有财产和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以国有制和官僚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他评论称：“本世纪的历史没有产生任何此类第三种制度。”

这些制度都具有工业社会的性质，尽管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中，工业是以不同方式管理的。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源自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以社会关系与技术为参照坐标来分割生产方式，我们就有四种方式来对比不同的制度。关于这一坐标的说明，请见“1976 年序言”的图 1。

科尔内教授是最早指出共产主义制度中固有结构性障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特别强调官僚制凌驾于预算约束和价格，造成长期匮乏。我引用的小册子试图解决由集体主义制度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问题。见雅诺什·科尔内《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基金会，伦敦，1998 年），第 2 页。

格兰岛屿中部的米德兰地区富含煤层，这里的人们开始在纺织业运用蒸汽动力织机。随着工业扩张，越来越多的工厂出现了。燃煤的蒸汽动力驱动火车和轮船，产生了新的运输方式。人们第一次可以在陆地上行进得比任何动物更快，在水面上比风速更快地航行。随着对卫生制度的更多了解，随着净化水和医疗进步——至少在西方世界——疾病不再造成灾难性后果。人口增加意味着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需求。随着现代化学的发展，通过聚合高分子化合物，人类首次制造出塑料等自然界没有的物质。

对经济学也出现了新的认识，劳动分工和生产率原则使人类可以以同等或较少劳动投入获取更多产出。破天荒第一次，经济盈余可以不靠剥削产生——除非劳动分工太走极端。过去，财富的获取通过战争、掠夺、奴役、税款包收等手段，是野蛮的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生产率增长并导致收入与财富增加的同时，经济盈余得以产生而不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至少，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承诺。

如果考虑到这些成就，我们知道，所谓“工业革命”（这个名称是100年前的1886年由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叔父老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Toynbee Sr.] 在牛津大学讲话中创造的）应被视同于对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新认识。技术不再仅仅是以再生产方式制造物品，而是目的与手段的合理安排，是工作乃至生活范畴的合理化。技术在程序上是工具性的，在设计上是美学的，这是魏玛共和国著名的包豪斯设计学院^①所主张的观念。这种美学观念也体现在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艺术家拉兹洛·莫霍里—纳吉（Lazlo Moholy—Nagy）、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和利昂奈尔·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作品中。

就这个层面看，可以说过去的200年是技术的“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帕斯（Karl Jaspers）用“轴心时代”一词来刻画公元前500年前后（或者更广泛地指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宗教和神性有所突破的古希腊时

① 包豪斯设计学院：1919年在魏玛共和国由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所创建，以崇尚功能性与简约性著称。世界公认其为现代设计的发源地。——译注

期。那个不平凡的时代涌现出波斯的琐罗亚斯德^①（Zarathushtra）、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 [Jeremiah]、以赛亚 [Isaiah]、以西结 [Ezekiel]）、希腊爱利亚学派哲学家（泰勒斯 [Thales]、阿那克西曼德 [Anaximander]、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这批先哲的同时涌现，真是神奇莫测，种种解释此处暂不研讨。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这一时期出现了使历史就此转折的世界轴心。现在，如果我们认为：过去 200 年出现了又一个新的轴心时期，人类能力的“突破”成为改变自然和物质世界的基础。这种看法是否过分？^②

工业社会的基石在于：控制能源（蒸汽、电力、石油与天然气）以驱动机器和涡轮；集团公司的纵向整合，如沃尔特·蒂格尔（Walter Teagle）所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控制着从油源到炼油再到汽油销售等一切环节，以及亨利·福特所发明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但我们又如何解释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呢？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率先在他的开拓性著作《经济发展的条件》（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1940）中给出了解释，将经济划分为几个部门：第一产业（采掘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经济发展以每个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人均产出）来衡量。

当每个部门的生产率上升时（就是说，只需较少人力来完成一定水平的产出），工人就可以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因此，经济进步可以定义为部门之间差异生产率的作用。服务业属于剩余范畴，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现在能够提供的额外福利。许多人在谈到后工业社会时，仍然把它定义为首先有关于服务业。这种定义是不恰当的。

① 琐罗亚斯德：波斯雅利安人，拜火教的创始人。——译注

② 关于卡尔·雅斯帕斯就“轴心时代”的重要讨论，见《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伦敦，劳特里奇与凯根·保罗出版社，1953年），译自德文版 Vom Ursprung und Teil der Geschichte, 1949年，特别是第1节与第5节。

我在1991年11月1日西班牙《国土报》（El Pais）组织若干欧洲报纸合作进行的莱昂纳多项目中发表了论文“第二个轴心时代”。

“第二个轴心时代”的主题是我未发表的一篇论述技术的手稿的框架，内含我在美国社会学联合会全体会议（1992年8月20日）上的讲话“时空的断裂：后工业时代的技术与社会”，以及我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接受社会科学塔尔科特·帕森斯奖（1993年2月10日）时的讲话。

克拉克狭隘地将服务业定位于“经济主义的”。这一观点源自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思想，认为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只有制造业才能通过劳动产生价值。但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错的。在当今社会，服务业主要发展“对人的服务”，特别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两者都是今天提高社会生产率的主要手段：教育提高人的技能，尤其是文字和运算能力；医疗保健减少疾病，使人们更加健康、适于工作。因此，我在写到服务业的时候，把这一领域进一步（在将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分别划分为“初级”与“第二”产业之后）分为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与公共事业）、第四产业（贸易与金融）和第五产业（医疗保健与教育等）。

但是对我来说，后工业社会崭新的中心特征是对理论知识的汇编以及科学对技术的新关系。每个社会的存在都基于知识以及语言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只是在 20 世纪我们才看到在探索新知识时对理论知识的汇编以及自觉性研究的发展。我们在科学对技术的新关系中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几乎所有 19 世纪的工业——钢铁、电、电话、汽车、航空、无线电——都是天才的工匠所创造的（例如贝西默、托马斯·爱迪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赖特兄弟、马科尼，这些人或者不关心科学，或者不理睬科学发展而独自钻研）。但是 20 世纪的重大发展——在通信、电脑、半导体和晶体管、材料科学、光学、生物技术等领域——都来自 20 世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革命：从爱因斯坦关于量子理论与光学的研究（它解释了光电效应并导致激光的发展），到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解码人体细胞染色体结构的基因工程。研究与发展为发明与创新服务，它们都是整个科学发展的一部分。

当然，没有一个社会会一下子充分长成，好比智慧女神密涅瓦从朱庇特头颅里生成的神话那样，而是不同侧面在不同时期出现，社会变化往往是新旧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我想在这里指出一些过去 25 年间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范围与程度，并以此与工业社会的特征相对照，这种比较即便只是纲要性的，也可能是有益的。^①

① 说明这些变化的图表被放在本书第一章。在 1999 年版序的末尾，我结合此处讨论的对比，做了一个修订表格。

一、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今天，在 1.26 亿美国劳动者中，只有 1880 万人从事制造业工作，而 25 年前则是 7700 万名劳动者中的 2020 万人。因此，现在有近 15% 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而 25 年前是 26%。我还需要指出制造业性质的变化，那就是：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减少，经过消毒、在无菌室制造的电脑芯片和药品生产兴起。这两种模式以许多方式相互补充。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发展基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发动机实验室设计的芯片而设计的高级神经网络程序以监控汽车发动机的故障。

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在 7 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中，制造业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7%，而服务业占 50%。

二、职业变化：工作性质上最惊人的变化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就业的极大上升，以及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相对下降。1996 年，在 1.26 亿劳动力中，有 3650 万人是专业人员和经理；几乎一半被划为管理者；3760 万人被归类为技师、销售和行政助理。这些人的总数超过 7400 多万，几乎占据劳动力市场的近 60%。与此相对，1350 万人列为熟练工人（精密生产与手工艺工人），1810 万人是操作工和劳工，总共为 3160 万，或劳动力的 25%。^①

三、财产与教育：在社会上取得地位与特权的传统途径是通过继承——家庭农场、家族企业或家传职业，以及较次要地通过创业或发挥企业家才干。今天，伴随着专业和技术工作的增多，以及企业家的身份同样要求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性的基础。1960 年，只有 41% 的美国人读完了 4 年高中（黑人只有 20%），而 1996 年，81% 的美国人读完了高中（黑人为 74%）。大学教育的变化更为惊人。1960 年，只有 7.7% 的美国人读完了大学（黑人为 3.1%），而 1996 年，几乎 24% 的美国人读完了大学，黑人为 13.6%（见《美国统计摘要》，表 243）。

四、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突出这一变化的另一种方式是认识资本作为资源的本质。在经济理论中，直至 30 多年前，资本主要被理解为积聚金钱或土地的金融资本。由于芝加哥大学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加里·贝克

^① 这两部分的数据引自 1997 年《美国统计摘要》表 645、649 与 693。